

●秦健民

略论古代书院藏书与书院教学、学术研究的关系

ABSTRACT In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in ancient China, book collections mainly include books for teaching. The book collection and book inscription activities ther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spread of research results. 11 refs.

KEY WORDS Library history.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Use of book collections.

CLASS NUMBER G253

书院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历朝共计7284所。书院制度形成于宋代,但书院的名称早在唐代就有了。据《新唐书·百官志》、《唐六典》记载,开元五年(717)年,唐朝政府组织文人于乾元殿校理经籍,乾元殿随之改为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三年(725)年,又将丽正修书院更名为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唐代除官方设置的书院外,民间私人创建的书院也为数甚多,其中有建置时间可考的,最早应推“张九宗书院”,在“遂宁县,唐贞观九年建”(嘉庆《四川通志》卷七十九),比集贤殿书院还早90年。

自宋以后,古代书院主要有三项职能:一是藏书(仍保留唐代书院的传统);二是奉祀;三是讲学。书院藏书供学者、生徒借阅利用,这是自书院制度形成以来的一贯传统。书院教师的讲学以讲书为主,生徒的学习钻研以读书为要。书院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活动主要是围绕着书而开展。因此就决定了书院必须收藏书籍。例如,“乐林书院在德安县,唐义门陈袞建,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光绪《江西通志》)“南国书院在浙江东州县,宋蒋友松建,聚书三万余卷。”(光绪《浙江通志》)又如

明代弘治中署知府胡光,改僧寺建立云南蒙化明志(崇正)书院,书院建成后即派人“直往江南中州市群书,贮于观文楼。于是云南诸学积书之富,惟蒙化为最。”(正德《云南志》)

书院从宋初到清末,绵延千年以上。书院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机构,其注重自由讲学、启发自学、学术研究以及会讲、讲会等特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它对于中国古代教育事业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下边就书院藏书与书院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关系作一些探讨。

1 书院重点收藏教学用书,密切配合教学需要

《碑传集》卷十七载:张伯行“建鳌峰书院以祀宋五先生,广置学舍百二十间于会城,俾有志正学者肄业,出家所藏书千卷,充仞其中。”同书卷九十又载:江西瑞州府同知焦贲亨寝疾在榻,“从容询及嵩阳书院,因赠书二种,命置之藏书楼,为诸生诵习。”《续碑传集》卷二十五载:胡林翼“为箴言书院,悉以家所藏书纳其中,使人知务实学。”皇帝赐书一直是书院藏书的来源这一。各朝赐书一般是御纂、钦定和官刻的正经、正史类书籍。书院的

发达同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宋、元、明、清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解理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理学家提倡的儒学经典也就成了书院的主要藏书部分,如“四书五经”。还有宋明理学大师的讲义、著述、语录、注疏等,皆为书院重要藏书成分。如清朝康熙中安徽安庆敬敷书院藏书中,有《朱子语类大全》、《朱子文集》、《朱子经济文衡》、《朱子注解小学》等。古代书院重点收藏上述各类教学用书。在藏书管理制度上,也注重藏书的借阅利用以密切配合教学需要。“书籍渐充,急需讲求读书之法,务令积书之后,与未积书之前,气象大不相同。要于文章经济上看出,于精神福泽上见出,于风俗人心上见出,才是藏书真实作用。非欲汗牛充栋、万轴琳琅,为夸多斗靡计也。”(《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凡院内外生徒亲来借书,董事及掌书生徒皆是同乡同学,务当待之以礼,勿有难色,勿有谩词。”(丰湖书院“借书约”)古代书院藏书重在利用的服务原则,至今对于学校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仍有借鉴意义。古代书院除了有较为成熟的藏书借阅管理制度,为了宣传、推荐图书,方便借阅利用,又较重视对图书目录的利用。书院将藏书编目悬牌于书院门首,令读者通晓。为了配合教学进度和学习要求,对教师指定学生每月所需阅读的图书,由图书管理人员——斋长负责把目录一一列出,使借阅者一览便知。

2 书院藏书为开展学术活动和传播学术研究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著名的书院,既是教育中心,也是学术研究中心。在教学和学术活动中,允许不同学派在书院讲学。理学大师朱熹于淳熙八年(1181年)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论语》中一章。同是理学大师,学术观点不同。朱熹不囿于一己之见,不仅请陆九渊讲学,还将他的讲义刻石立于院门。朱熹对

这次讲学很满意,认为“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朱熹由此开创了书院的讲会制度,这次讲会又开创了不同学派在书院讲学的先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内容及“讲会”等制度,百家争鸣,使书院的学术研究活跃起来。而且成了地区性的学术集会,使书院的教学和社会上的学术活动结合起来。书院主持人既从事培养人才的教学工作,又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工作,并把学术研究作为教学的重点,组织学生参加研讨和著书、编书、刻书。聚书、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特点之一。书院藏书丰富,缘其来源广泛。募集、捐赠、书院购置、皇帝赐书和书院刻书等都是书院藏书补充的多种途径。在书院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围绕书院的上述学术活动,书院刻印和收藏师生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书院聚书、藏书一大特色。

“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相互易而传布之,故书院刻书有三善焉:山长无事,则勤于校讎,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版不储官,而易印行,三也。”(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书院山长和教师,多由名师硕儒担任。书院的教学活动有好多种形式。书院中许多活动是围绕着书展开的。在教学过程中,名师往往通过自己的著述、讲义等书籍,布置学生自行钻研、自行理会。书院的山长等名师大多淹通坟籍,学识渊博,识见深邃,故著述颇丰。以元代为例,东湖书院山长赵文著有《青山集》,安定书院山长任士林著有《松乡文集》,景星书院山长黄泽著有《易学濫觴》,丽泽书院山长袁桷著有《延佑四明志》,澄江书院山长许恕著有《北郭集》,贞文书院山长周闻孙著有《螯溪文集》等。因此,对于既是教育中心又是学术中心的古代书院,著名学者胡适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在这样的“大学研究院”里,主持工作的山长以及名师硕儒对于著述和刻书倾注了大量精力。例如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一生在学术上著述甚多。他

不仅自任白鹿洞书院洞主,自为导师,升堂讲说,亲临执教,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刻书名家、出版专家。他刻印了自己和其他学者的著述,如《论孟精义》、《近思录》、《南轩集》、《献寿记》、《永城学记》等。朱熹亲自参与刻书活动,往往事必躬亲。朱熹一生讲学著书,对保存和传播我国古代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现有许多文集、志书、学案中保留了不少书院“升堂讲说”留下的讲义。如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讲义有《中庸首章》、《大学或问》、《白鹿洞讲学策问》等。白鹿洞书院至今尚存讲义一类的文献资料四十余种。书院刻书多且不乏善本。如元代梅溪书院刻《类编标注文公朱先生经济文衡》,屏山书院刻《止斋先生文集》,梅隐书院刻《书集传》,豫章书院刻《豫章罗先生文集》。元大德三年(1299年)广信书院刻《稼轩长短句》卷十二后有“元大德己亥中吕月刊毕于广信书院,后学孙粹然,同职张公俊”两行,知为广信书院刻本。据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此本酬和赠送范先之词共十首,别有宋时甲乙丙丁四卷本八首都作“廓之”,余二首不著姓名。案范先之原名当作“廓之”,四卷本刻于宋宁宗赵扩即位前,故用本名。此本祖本则刻于宁宗朝,或已在稼轩身后,故刻时避宁宗讳嫌名改“廓之”为“先之”。可见此本渊源之古。此本流传最广,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诏刻之,二十四年(1545年)何孟伦再刻之。毛氏汲古阁本虽合并为四卷,事实上亦源出此本。清光绪间王鹏运四印斋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印本,均据此帙翻印。

明代至清代,书院刻书风气益盛。如清代乾隆年间,原白鹿洞书院生徒王岐瑞编成《朱子白鹿书院讲学录》付梓。刘熙载主讲龙门书院十四年,共著作有《四音定切》四卷、《说文双声》二卷、《说文迭韵》二卷、《持志塾言》二卷、《艺概》六卷、《昨非集》四卷。这些著述都是他晚年在书院自行校刊行世的。乾隆三十年,“大中丞梁公”延聘铎峰先生到岳

麓书院讲《周易》。铎峰手著《周易启蒙》,开讲之日,“诸生百余人衣冠环听,靡不惊为闻所未闻。”于是,山长万莱峰决定刊印此书。后因故未及书院付印,但其原版为苏州友人携去刊布,书得以流传各地。广东广雅书院刻书178种,2096册,计5746卷,均为历代学者的学术著作,如宋代王溥的《五代会要及校勘记》、《唐会要》,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明代王应麟的《少室山房集》,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等。

在书院教学活动中,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学生以自学为主,质疑问难与释疑解惑相结合。例如,朱熹在漳州任上,陈淳登门拜朱熹为师。朱熹授以“根源”(天理,天命)两字,要求所有义理,都必须探究其根源,陈淳遵循教导,潜心钻研,多方寻求事例印证。学成,编为《问卷》一书。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是书院很有特色的学术传授的方式方法。在书院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对学生的每日课程作出规定。广雅书院规定“各生各列课程日记,按日注明所业于簿,诵习钞录,记其起止,解说议论,有得即记,以便院长按业考勤”。“朔望行礼后,各携所业日记簿,呈院长听候考核问询。”有的书院提倡学生做札记,每日将专精和涉猎某书某篇的学习心得记于册上。朱一新为广雅书院院长,曾将学生的考核问答之辞加以整理,印成《无邪堂答问》五卷,并作了序。藏书六万余卷的苏州正谊书院刊印师生的日记汇编《学古堂日记》。岳麓书院、诂经精舍等刊刻学生的论文(课艺)集,如《岳麓书院课艺》、《诂经精舍集》等。《诂经精舍集》八集,内容为学生课艺菁华,计二千余篇。

参考文献

- 1 李希泌,张叔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
- 3 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陈沈珍

谈山区公共图书馆的农业信息服务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public libraries in mountainous districts to provid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an era of market economy in present China. We can use such ways a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ve services to meet needs of peasants, agricultural researchers and decision makers in various levels. 5 ref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ies in mountainous districts.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s.

CLASS NUMBER G252

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坚持把加强农业放在首位,是事关全局的头等大事。当前,我国农村正进入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但最终要靠科学技术。农村要做到依靠科技进步振兴经济,真正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最终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农业信息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农业科技进步的全过程和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都与农业信息的吸收、活化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图书馆开展农业信息服务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主要表现为:有利于促进各级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有利于帮助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有利于加速农业科研的进程,有利于农村科学文化的

宣传普及,有利于推动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也有利于提高图书馆员的自身素质,激活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功能。

山区公共图书馆指的是地处山区的市、县图书馆和乡镇图书馆,它们是山区的知识信息中心。以福建省为例,除了沿海,其余都是山区。由于山区地域分散,交通不便,人文环境相对纯朴,对知识的获取和信息的收集比较困难,造成人们的知识信息需求极为分散,难以集中成为一种趋势和群体需求;加之经济欠发达,缺乏规模和产业化,难以形成高层次的信息需求;又由于山区大部分是农业地区,对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技术及与山区经济有关的信息需求相对集中。这就是山区所处的信息需求环境,反映出山区信息需求的特点。

- 4 李致忠. 历代刻书考述. 成都:巴蜀书社, 1990
- 5 丁钢, 刘琪. 书院与中国文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 6 曹之. 中国古籍版本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 7 杨慎初等. 岳麓书院史略. 长沙:岳麓书社, 1986
- 8 李才栋. 白鹿洞书院史略.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9
- 9 刘伯骥. 广东书院制度沿革. 商务印书馆, 1939

- 10 盛朗西. 中国书院制度. 上海:中华书局, 1934
- 11 叶德辉. 书林清话. 北京:中华书局, 1957

秦健民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资料室主任, 副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苏州市. 邮编 215006.

(来稿时间:1998-09-15. 编发者:刘喜申)